

朱本轩 主编

汉语言文学专业“专起本”系列教材

古代写作学 概论



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

古代写作学概论

张廉新 王景科 李宗刚

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

(鲁)新登字 15 号

古 代 写 作 学 概 论

张廉新等

*

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青岛市鱼山路 5 号

邮政编码 266003

新华书店经销

*

1995 年 7 月第 1 版 199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32 开本(850×1168 毫米) 10.75 印张 268 千字

印数 1-3000

ISBN 7-81026-753-1

H·69 定价:14.00 元

序

遵照山东省教委指示，我山东师大中文系，从1992年开始，招收师范专科毕业生升入本系，单独编班继续学习全日制二年的本科课程。早在1984年即招收夜大、函大中文三年本科，为已达专科毕业程度的学员，进行业余三年制本科课程的教学。这既为有志深造者开辟了多渠道提高的进程，又为现代化建设培养了更多专门人才，是时代改革浪潮催生的新事物，因而充满生机，呈兴旺发达趋势。我系为适应这种专科起点的本科教学的特殊需要，填补这一特定教学阶段本科教材的空缺，经过反复酝酿研究，决定编写一套《汉语言文学专业“专起本”系列教材》。

系列教材的编写，要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根本方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和培养“四有”新人的时代要求，在原有专科教材的基础上，开拓理论视野，更新知识结构，另编成与“专起本”教学对口适用、精确规范的配套教材，以保证阶段性教学质量的提高，也希望对我系长远的课程改革起突破性整体推动作用。

提高系列教材的编写质量，须特别注意与专科教材（包括我系目前使用的一般本科教材）的联系和区别，在内容上应是专科必修基础课的拓宽与加深。为掌握好“宽”、“深”适宜的度，结合我们的教学体验，经过仔细研究，提出以下编写原则要求：

一、提高科学性

系列教材必须按照高师中文专业四年制本科的培养规格及各科教学大纲，组织其合目的、合规律的科学内容，并以严格务实的科学态度，纳入质与量的规范程序，使每种教材都成为各学科专科阶段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的补充、深化和扩展。一般不再重复已学过的知识系统，也防止选修课式的过高过专的学术探讨。可以参照全国统一制定的本专业二年制专科教学大纲和成人高考“专起

本”复习考试大纲作为量化分析的起点,广泛吸取相关教材的长处,并超越其面面俱到的线性表述格局,多就各学科自身的要义精髓和重点难点问题,作集中深入阐释,显示出基础性专题研究的力度与教学革新品格。

二、加强现代性

当前科技的进步、知识的激增,给高校课程内容的更新提出了更高更快的要求。我们提高系列教材的编写质量,除切实掌握以上课程范围和程度的明确界定外,还要注意运用现代意识和多维视角,敏锐吸取各学科研究的前沿成果,使构成教材的观点、材料和方法,克服单向封闭状态,尽可能立足于“三个面向”的高度,善于启发学生创造性心理素质和学习能动性,着重培养灵活切实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和能力。

三、讲求实用性

系列教材编写的目的、对象,主要是为全日制本科二年制师生提供教学依据,同时也要照顾成人业余进修的特点、规律,力求论析深入浅出,行文简练概括,加强联系实际,启迪智慧、培养能力的实用功能。同时在编写体例上,也要大体一致,一般要按编、章、节的等次序列,组成以不同专题为纲目的、有一定内在联系的板块结构;中间可有集纳基础知识精华的简要概述,更要突出必要的重点章节作精细论列,每章后都应提出适量的思考练习题和参考资料索引,以求在虚实详略的有机穿插中,增强宜教易学的弹性,促进独立自学的积极性。

根据编写的总体设想和原则要求,决定这套系列教材共包括11个分册,科目名称分别定为:

- | | |
|---------------|-------------|
| 1. 古代汉语专题研究 | 2. 现代汉语专题研究 |
| 3. 中国古代文学专题研究 | 4. 中国现代文学史论 |
| 5. 中国当代文学史论 | 6. 外国文学专题研究 |
| 7. 文学理论专题研究 | 8. 古代写作学概论 |

9. 美学通论

10. 马列文论选读

11. 语文教学专题研究

(随着教育,教学改革的发展,可作相应调整),每个分册编写一本,每本约25万字(《中国古代文学专题研究》可编为上下两册)。

总起来看,这套系列教材的编写,并非应急而作的急就章,是我系教师经过思想的、理论的、实践的准备,发挥群体智慧,深入开展的教改试验,是一项严肃而有切实意义的教材建设系统工程。每一参编教师,都应在统一意志中,发扬各有千秋的才智,作出我系教学改革上富有继往开来意义的重要奉献!

古希腊辩证法的奠基人赫拉克利特有一句名言:“一切皆流。”我从前新时期高等教育的学制、课程、教材与教法,也处在日新月异的变革发展中。我们今天为中文专业“专起本”教材所作的建设性努力,只要是认真坚实的,肯定会成为将来更理想层次上的前进基因。那么,就让我们从这里开始,满怀信心地探索试验,迎接跨世纪教育改革的新辉煌!

当然,由于我们认识和经验的不足,理想化的要求难以完全体现,预料不到的问题、缺陷也可能不少。我们诚恳期待着批评指正,以不断修改提高。

冯中一

1994年8月15日

目 录

序

第一章 导论	(1)
第一节 中国古代写作学研究的对象	(1)
第二节 研究中国古代写作理论的任务	(12)
第三节 研究中国古代写作理论的方法	(18)
第二章 主体修养论	(22)
第一节 功夫在诗外	(22)
第二节 积学储宝	(26)
第三节 澡雪精神	(46)
第四节 “有德者必有言”辨	(53)
第三章 构思论(上)	(58)
第一节 以意为主与意的提炼	(59)
第二节 象与构象	(76)
第三节 境与造境	(94)
第四章 构思论(下)	(109)
第一节 神与物游	(109)
第二节 贵在创新	(125)
第三节 《文心雕龙·神思》述要	(135)
第五章 传达论(上)	(143)
第一节 传贵“达”	(143)
第二节 传达与章法	(148)
第三节 传达与词采	(161)
第四节 传达与用典	(178)
第六章 传达论(下)	(186)
第一节 迟与速	(186)

第二节	繁与简·····	(195)
第三节	雅与俗·····	(201)
第七章	修改论·····	(207)
第一节	修改的重要性·····	(207)
第二节	修改的态度·····	(208)
第三节	修改的内容·····	(211)
第四节	修改的原则·····	(218)
第五节	“不烦绳削而自合”辨·····	(224)
第八章	灵感论·····	(229)
第一节	灵感释义·····	(229)
第二节	中国古代灵感理论的诞生·····	(232)
第三节	灵感的特征·····	(236)
第四节	对灵感现象的理论解释·····	(240)
第五节	灵感的培养和激发·····	(245)
第九章	文体论·····	(250)
第一节	文体发展理论述略·····	(250)
第二节	刘勰《文心雕龙》对文体论的贡献·····	(264)
第三节	诗性文体写作特点述要·····	(266)
第四节	非诗性文体写作特点述要·····	(283)
第十章	风格论·····	(306)
第一节	风格学产生与发展·····	(306)
第二节	“文如其人”——作家风格·····	(310)
第三节	“文变染乎世情”——时代风格·····	(317)
第四节	“文善醒,诗善醉”——文体风格·····	(322)
后记	·····	(332)

第一章 导 论

第一节 中国古代写作学研究的对象

中国古代写作学研究的对象可以从两个层面上去看,其深层内容是中国古代写作理论的模式及其发展变化的逻辑,这个层面的内容是带根本性的,然而却是潜在的,它必须依赖一定的具体形态表现出来。所谓具体形态就是古代写作理论家们留下的各种理论著作和资料。这是中国古代写作学研究的入手处,亦可称之为直接研究对象,或直接内容层面。

中国古代的各种文论、诗论著作,都是古代写作理论家们对自己或别人的写作经验的总结、探讨,尽管良莠不齐,但却经过了一定的理论概括,具备了一定的理论层次,为我们今天的研究提供了非常丰富、质量很高的理论资料。与各类文章和文学作品相比较,这些理论著作对我们今天的研究更为重要,因此,这些理论著作将是我们重点分析、研究的直接对象。

通观 3000 年的中国文化史,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写作理论,具有两大特点:丰富性和独特性。

一、丰富性。中国古代写作理论资料,大体有三条发展线索。

从先秦著作中的论文之语,到清代文学大家、文论、诗论家们论文的篇章著述。

从先秦著作中的论诗之语,到清代的各种诗话、词话、曲话。

从先秦著作中有关诗事的记述,到唐宋以后含有谈诗内容的笔记著作。

三条大河，汇成了浩瀚的大海，仅从诗话一隅，即可窥见一斑。据今人蔡镇楚统计，“现存已见中国历代诗话已逾千部之多”。

为了便于读者了解，我们拟作如下极为简括的轮廓式的介绍。

魏晋以前，是我国古代写作理论的奠基期。先秦贤圣们关于写作方面的言论，往往杂见于一些哲学和历史著作中。他们不是专门研究文章写作，而是在探讨自然和社会问题时，涉及到语言文字表达的某些方面。或者是他们的某些见解在后人看来对写作问题有所启发。这些资料，尽管是片言只语，但是由于它们是伴随着对自然本体和社会问题的探讨而产生的，有些是相当深刻的。孔孟、老庄等一些大儒哲人的言论，奠定了中国古代写作理论的基础，为中国古代写作理论中一些最重要的部分勾画出了基点。《尚书·尧典》中的“诗言志”被朱自清先生誉为中国古典诗歌的开山理论纲领。清代学者纪昀也说：“鍾嶸以后，诗话冗杂如牛毛，而要其本旨，不出圣人之一语《书》称‘诗言志’是也。”孔子的“思无邪”说，“兴观群怨”说，孟子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说等成为后世文人写作的理论规范。庄子“庖丁解牛”、“佝偻承蜩”、“轮扁凿轮”等故事，本来在于阐发他的哲学思想，后来的作家、诗人、艺术家们却从中悟出了自然神妙的艺术精神。这正如《文心雕龙·宗经》篇所指出的“并穷高以树表，极远以启疆，所以百家腾跃，终入环内者也。”

两汉对写作理论研究有卓著建树者首推王充。《论衡》85篇，其中《自纪篇》、《超奇篇》、《艺增篇》、《对作篇》、《佚文篇》等很多篇章都论及写作问题，并有不少见解是相当精辟的，对齐梁之际刘勰撰写写作理论巨著《文心雕龙》有很大影响。西汉扬雄的《法言》、东汉班彪的《史记论》、班固的《汉书·艺文志》等，也都有许多关于文章写作的有价值的看法。汉代的诗论著作，要首推《毛诗序》。《毛诗序》是西汉人毛萸所撰《诗毛氏传》在首篇国风《关雎》题下的一篇序言，它提出了比较系统的儒家诗学观的若干原则，成为经典性的诗论著作。

魏晋六朝为我国古代写作理论的繁荣期。魏晋时期，中国文学发展到自觉阶段，文学从哲学、历史学中脱离出来。总结写作经验的写作理论也随之以独立的面貌出现，这一时期，最为引人瞩目的是四大写作学著作：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和锺嵘的《诗品》。《典论·论文》是中国文化史上第一篇论文专著，是一篇作家风格论纲，开以“气”论文的先河。《文赋》是第一篇真正的文学创作论。《文赋》以前的许多写作言论或篇章，重在阐发文学的社会作用、教化功能，强调写作主体的道德情操修养，只有《文赋》才开始对写作过程进行研究。《文心雕龙》是中国文化史上最全面、最系统、最丰富的写作理论著作，是中国古代写作理论的第一高峰。《文心雕龙》共五十篇，当今学者们将其划分为总纲、文体论、创作论、批评论和序言五个部分。《文心雕龙》问世之后，一直受到历代文人诸如沈约、刘知几、孙光宪、胡应麟、章学诚、鲁迅等的高度重视。章学诚称“《文心》体大而虑周”（《文史通义·诗话》）。鲁迅更认为：“东则有刘彦和之《文心》，西则有亚里士多德之《诗学》，解析神质，包举洪纤，开源发流，为世楷模。”这是我们中华文化的荣耀。锺嵘的《诗品》是六朝时期影响最大的一部诗论著作。被章学诚誉为“诗话之源”（《文史通义·诗话》）“诗品”即品诗，锺嵘在品评各家诗作时对诗歌创作提出了一些极有见地的主张。比如力主“自然”反对雕饰，提倡“直寻”，反对用事，认为诗歌艺术要有“滋味”，要“文已尽而意有余”。除上述4部著作之外，如挚虞的《文章流别论》、任昉的《文章缘起》、李充的《翰林论》、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文章篇》等，也都是具有一定理论价值的著作。

唐宋为我国写作理论的发展期。唐代是个颐指气使，奋发向上的社会，伴随着各项事业的发达，诗歌和散文创作出现了高度繁荣的局面。以韩、柳为领袖和主将的古文运动，不仅从写作实践上，而且从写作理论上一扫六朝形式主义文风的影响，对写作理论深入而健康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当时，影响较大的文论著作有韩愈

的《答李朔书》、《送孟东野序》、《调张籍》等；柳宗元有《答韦中立论师道书》、《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等。史学家刘知几的《史通》中的《叙事》、《言语》、《浮词》、《模拟》等也是阐发写作理论的精彩篇章。后人以唐人善作诗不善言诗的说法，唐代的诗论著作前与六朝、后与宋代相比，的确有些薄弱。但也不可忽视其独到的价值。日僧遍照金刚的《文镜秘府论》保存了已经散失的别人诗论著作中的资料。王昌龄的《诗格》、皎然的《诗式》为意境理论奠定了基础。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以独特的方式为中国古代写作学的风格理论增添了丰富的内容。陈子昂的论诗论文的篇章，白居易的《与元九书》也是古代现实主义创作理论的重要篇章。

宋人重视理论思考，儒学和写作学都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尤其是诗话，自欧阳修的《六一诗话》问世后，如雨后春笋，很快蔚为大观。据郭绍虞《宋诗话考》宋代的诗话著作“现尚流传者”有42种，“部分流传”或本无其书而由他人纂辑成者有46种，“有其名而无其书，或知其目而佚其文，又或有佚文而未及载者”有51种。再加上其中附及的数种，共约140余种（刘重德、张寅彭《诗话概说》）。王大鹏等编选的《中国历代诗话选》选录标准较宽，入选两宋诗话207种。

欧阳修《六一诗话》，共1卷28条，可视为北宋诗话的代表，是以“诗话”命名的诗学著作的第一部，开闲谈式、点悟式评诗的先河。《六一诗话》注重诗的立意、创新、自然、含蓄。主张写作须精心构思，反对创作上的粗率、浅露。对宋初诗歌创作中的一些不良倾向例如智诗创作上的熟滥，后进学者仿效西昆而产生的弊病等作了批评。《六一诗话》对诗话的发展影响巨大。北宋后期的诗坛是苏、黄主盟。苏轼有《东坡诗话》、《东坡诗话补遗》。前者是“好事者”辑成，后者是口人近藤元粹从《东坡志林》中辑出。黄庭坚有《山谷诗话》，并非自著。苏、黄对写作理论的贡献主要不在他们的诗

话著作。一在他们诗歌创作的影响；二是体现在其诗文、序跋、书简、杂记之中。苏轼在中国古代文学艺术史上的影响几乎是无与伦比的。

南宋理论价值比较高的诗话，有葛立方《韵语阳秋》、张戒的《岁寒堂诗话》、黄彻的《碧溪诗话》、姜白石的《白石道人诗说》、严羽的《沧浪诗话》、刘克庄的《后村诗话》、范晞文的《对床夜语》等。其中对后世诗学理论影响最大的要数《沧浪诗话》。这部诗话共1卷，120余则，分《诗辨》、《诗体》、《诗法》、《诗评》、《考证》五个部分。《诗辨》阐发诗学理论；《诗体》论述诗歌体制；《诗法》阐述作诗法则；《诗评》品评诗人诗作；《考证》辨订作品的文字和作者。严羽的诗学理论，可以归纳为三个环节：创作上主张以识为主，入门须正，立志须高，以汉魏盛唐为师，经由妙悟，掌握艺术规律；追求兴趣，达到审美佳境。其方法论特点是以禅喻诗。严羽的诗学理论，上承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下启明代的前后“七子”、清代王士禛的“神韵”说和袁枚的“性灵”说。

宋代由于诗话的繁荣，文论著作影响不是太大。除了欧阳修、苏轼、苏辙、苏洵、王安石等名家一大批关于论述写作的文章外，还有不少写作学专著出现。如陈骥的《文则》、李涂的《文章精义》、吕祖谦的《古文关键》等。

明清为中国古代写作理论的集大成期。明清两朝的文学创作都不如宋，远不如唐。但在写作理论方面，出现了六朝以来的第二个高峰。数量和质量都是空前的。论文的著作主要有：明代方以智的《文章薪火》、高琦的《文章一贯》、朱基宰的《文通》；清代黄宗羲的《论文管见》、魏际瑞的《伯子论文》、魏禧的《目录论文》、刘大猷的《论文偶记》、吴德旋的《初月楼古文绪论》、屠彪的《读书作文谱》、刘熙载的《艺概》、林纾的《春觉斋论文》等。文体学著作如明代吴讷的《文章辨体》、徐师曾的《文体明辨》。上述著作，以《艺概》的理论价值为最高。《艺概》分《文概》、《诗概》、《赋概》、《词曲概》、《书

概》、《经义概》六个部分，被人誉为中国最早的一部艺术概论。本书内容丰富，涉猎广泛，对作家作品的评论、对写作规律的探讨时有灼见。评论言简意赅、观点颇为辩证。明代的诗话，数量不算太多，能代表这一代诗话水平的有：李东阳的《怀麓堂诗话》、徐祯卿的《谈艺录》、杨慎的《升庵诗话》、谢榛的《四溟诗话》、王世贞的《艺苑卮言》、胡应麟的《诗薮》。清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终结的时期，也是我国封建意识形态的总结和集大成时期。这种总结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诗话来完成的。据初步统计，清人诗话有400余种（刘重德、张寅彭《诗话概说》），数量既多，质量也高。王夫之的《姜斋诗话》、叶燮的《原诗》、王士禛的《带经堂诗话》、袁枚的《随园诗话》、陈衍的《石遗室诗话》、沈德潜的《说诗晬语》、翁方纲的《石洲诗话》、吴乔的《围炉诗话》、冯班的《钝吟杂录》，都可为历代诗话之冠。其中的《原诗》尤为后人所瞩目，美籍华裔著名学者刘若愚曾指出：《原诗》“虽算不上是离经叛道，但却对诗发表了一些独特的见解”，“是中文诗论中少数有系统的作品之一”（《中国的文学理论》）。叶朗先生也认为，《原诗》“不是局限在对作家、作品枝枝节节的评论，而是始终把艺术问题提到哲学高度来进行研究和讨论的。”（《中国美学史大纲》）。

明清写作理论还有令人瞩目的一面就是戏剧和小说创作理论的繁荣。中国文学同西方文学一个明显的不同，就是抒情诗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叙事文学迟迟得不到充分发展，直到明清才得以繁荣，叙事文学的创作理论达到空前的高度。就小说理论而言，明代有李贽评《水浒》，叶昼评《三国》、《水浒》、《西游记》；清代有金圣叹评《水浒》，张竹坡评《金瓶梅》，毛宗岗评《三国》，脂砚斋评《红楼梦》，他们对小说的叙事技巧、语言的运用，人物形象的塑造等都有相当深入、系统、细致的阐发，就戏剧理论而言，明代徐渭的《南词叙录》、何俊良的《四友斋丛说》、魏良辅的《曲律》、王骥德的《曲律》等都是颇有影响的戏论著作。其中王骥德的《曲律》是一部系统的

戏剧理论著作，是对前此中国古典戏剧创作经验和理论研究的总结。谭帆、陆炜在他们的《中国古典戏剧理论史》一书指出：

进入清代以后，戏剧理论批评又迎来了一个成果辉煌的时代。在这时期中，戏剧理论批评我们不妨可以用“博大精深”四字加以概括。“博大”如李笠翁，他在《闲情偶寄》中全面总结了我国戏剧艺术和戏剧理论，成了中国古代戏剧理论史上最富有体系和总结性的著作。代表了中国古典戏剧理论的最高成就，这在戏剧理论史上是前无古人而又后鲜来者的。而“精深”则如金圣叹的《西厢记》评点，孔尚任的《桃花扇》自评、毛声山、毛宗岗的《琵琶记》评论、吴吴山三妇合评的《牡丹亭》批本等，都在戏剧批评的深度上远远超越了前此的戏剧批评著作。

中国古代写作理论著作，资料如此丰富，为古代写作理论体系的探讨提供丰厚的基础，同时也为我们的爬梳、分析、整理工作增加难度。

二、独特性。这是同西方的文学创作理论形态相比较而言的。常识告诉我们，文学创作理论根源于美学理论，美学理论根源于哲学观。而哲学观又最终产生于每个民族所处的生活环境和生产方式。西方社会由于地理环境和其他因素的关系，在很早的时候就形成了一种商业社会。人们追求发展，不怕冒险。但商业活动毕竟很不稳定，祸福无常。由于在商业活动的初期，人们只感到破产或灾难的威胁，不懂商业的规律，在这种难以把握自己命运的情况下，人们就会将灾难归罪于自然，认为自然中存在着一种可怕的、神秘的力量，故意同人类作对。这样，西方人在早期的社会活动中，就埋下了对自然怀有敌意的种子。不管是西方人早期的对自然的不信任，或中世纪时的对上帝的膜拜、畏惧，都是一种对立。这就是西方人的宇宙观的天人对立的根源。商业活动，个体活动突出，具有很强的竞争性甚至欺诈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相对疏远，情感相对淡

薄,这又形成了人与人之间一定程序上的对立。这种天与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经过千百年的实践和积淀,就逐渐形成了西方人的重矛盾、重对立、重差异的宇宙观和方法论。宇宙观包容对一切事物的认识,当然也就包容了对文学艺术的认识。中华祖先同早期西方人的情况很不相同。中华祖先在中原的沃土上相当安定的生存和发展。东临大海,西阻群山,环境是相对封闭的。农业活动相对稳定,只要人们不怕流汗,土地对人们的赐与也是足以使人们知足的,民众是土地的主人,土地是民众的命根子,战国时期,晋公子重耳出亡向农民讨饭吃,农民奉上一捧土的故事就很典型。中华先人的这种生产方式和生活境遇,就必然形成同大自然的亲和关系。中华民族“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就根源于此。自足性的农业生产又形成了同西方人有所不同的社会结构。中国社会,自古以来就是以家庭为基础,以血缘亲情为纽带,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重感情。这种天与人、人与人的关系,逐渐形成了中华民族重“整体”、重“统一”、重“综合”的宇宙观和方法论。李约瑟在他的科学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等著作中充分强调了中国古代“有机整体”的认识方法对中国思想史、科学史、文化史的巨大影响。欧洲人却是自古以来,就是不断地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极端,从来没有能够综合起来。总而言之,欧洲人的宇宙观和方法论是偏重于种学的,中华民族的宇宙观和方法论是偏重艺术的。

但也不能由此产生一种误会,认为中华民族的宇宙观和方法论是封闭、僵化、落后的。我们应看到,人对客观对象的把握由综合到分析是一种进步,由分析到综合又是一种进步。耗散结构理论的创始人普利高津在中国留美学生与访问学者国庆35周年大会上指出:“中国传统思维特点在实现现代化计划中具有一种优势。西方的科学家与艺术家习惯于从分析角度来观察现实,中国的哲学则表现出一种整体观念,而当代演化发展的一个难题,恰恰是如何从整体的演化上来理解世界多样化的发展。”同样也不能因此就认

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方法论就绝对的优胜于西方人。正确的看法应该是各有短长。否则，中国人和西方人各自创造了灿烂的文化也就成为不可理解。

十一

宇宙观和方法论的不同，就决定了中国人和西方人一切理论形态的差异，当然也包括着我们所研究的文学写作理论形态的差异。

(一)中国古代写作理论重领悟、重直观。前面曾有几处提到，魏晋以前中国古代文化处于文史哲混一存在的状态。最早站出来阐释文学问题的是一些哲学家们。当西方的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们在《理想国》和《诗学》中对史诗进行长篇大论的逻辑分析的时候，我们的孔夫子、孟夫子却提出了警句般的关于文学的纲领性的见解，例如“诗言志”（《尚书》）、“兴、观、群、怨”，“思无邪”，“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等。道家的创始人老庄也在大讲“涤除玄鉴”，“道之为物，惟恍惟惚”（《老子》），“心斋”、“坐忘”（《庄子》）。我们认为这些言论都可以视为中国古代诗学之源，也是中国古代诗学理论形态之源。孔孟老庄的这些名言，似乎经过了高度压缩，其中蕴含着极为丰富的理论内涵，从传达的方式看它是一种“点”，从接受方式看，它是一种“悟”。这种一“点”一“悟”的传释过程一直延续至今而无终止。孔孟老庄们的思维模式和理论形态，预示并决定了此后历代诗论、文论家们的思维模式及理论形态。刘勰的《文心雕龙》和叶燮的《原诗》可以视为具有逻辑分析的特点，但毕竟是凤毛麟角，绝大多数都属于点悟方式。中国古典诗学中的一些著名范畴，例如：钟嵘的“滋味”、司空图的“象外之象”、严羽的“兴趣”、王士禛的“神韵”、翁方纲的“肌理”、袁枚的“性灵”等都是意蕴丰富，重在领会，很难加以明晰、准确的阐释。再看一些作家作品评论，例如：苏轼评孟郊、贾岛、元稹、白居易为“郊寒岛瘦，元轻白俗”（见方回《跋方君至庚辰诗》）；刘熙载评“昌黎之文如水，柳州之文如山”，评“半山文瘦硬通神”；评庄子文“怒而飞”（《艺概·文概》）。魏庆之在